

成以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部门，要跨越学科的限制，超越学科分类的局限，形成以问题的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指南，对跨学科研究作出积极的引导。

第五是研究结果的评价体制与机制。其中包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学术的分类、学术评价的分层和分解等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内涵，学术的内涵并不只是纯粹的论文和专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有意义的所有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包括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内涵，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学术的分类也不应该等同于学科的分类，学科的研究不等于学术的分类。跨学科研究要突破以学科为学术分类标准的做法，形成适合于问题的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标准。关于学科评价的分层、分解问题，应当注意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评价。对于在书斋里花费20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巨著，应该有一套评价办法；对于200人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一份不足万字的同样高水平的咨询报告，应该另有一套评价办法。如果把这两个成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就难免会产生学术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学术成果的评价应该分类和分级，至少应该区分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这样不同的评价标准。

先从上述这五个方面推进，跨学科路径可能会越走越宽。跨学科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我们既要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又要找到当前走向跨学科研究的路径。我们也寄希望于《中国社会科学》，能为此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责任编辑：许健康 张 征〕

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

王 绍 光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在北京大学读法律的我还不知道政治学为何物，因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那时还没有正式恢复。

说起来，中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相比现代政治学发源地——美国，仅仅短了十几年而已。^① 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是极少数人的禁脔，^② 但政治学的发展却有点不成比例。1936年，全国的大学不过百余所，其中39所办有政治学专业。那时，全国在校大学生只有区区几万人，

①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那一年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参见 A. Somit and J.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Irving Publishers, Inc. 1982.

② 民国38年间，全国一共只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直到解放前夕，中国只有89个大学与52个专科学校，在校生8万余人。见刘海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与进退——以介绍分析一份重要的高等教育统计为中心》，《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2期，第9页。

政治学系学生的数目却仅次于法律系学生，是第二热门的科系。^①也许，废除科举制后，不少人把研习政治看作了通向仕途的终南捷径。不仅学生如此，学者也是如此。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学会”首届干事会有11位成员，^②其中高一涵、王世杰、杭立武、梅思平、钱昌照、吴颂皋、张慰慈、刘师舜等8人都长期在宦海沉浮（除高一涵、钱昌照外，这些人要么当了汉奸，要么解放后没有留在大陆），只有钱端升、张奚若、周鲠生3人（解放后，他们三人都留在大陆）大部分时间留在校园里耕耘。

说解放前政治学畸形发展，也只是相对于当时大学教育的规模而言。其实，那时全国的政治学者不过百把人，^③每个系的教员多则十来位，少则一两位；每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三五百人。就学术水平而言，那时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几乎完全取法西洋，鲜有独创性的思考，连教科书也多采用西方教材。学者们的著作对中国问题研究不多，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④

如果说解放前政治学起点不高的话，那么1952年取消大学政治学系科以后，政治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干脆不复存在了。1960年以后，有些大学重建了政治系，但以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主，目的是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争论，几乎完全不涉及与国内相关的政治学问题。1964年以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倒是更名副其实。不过，当时关注的“国际政治”主要是两类运动，即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际政治的其他方面很少涉及。

1978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⑤次年，邓小平又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⑥“补课”的确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在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邓小平号召“补课”前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也建立起政治学研究所。不过，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是在1980年12月召开的。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与政治学重建发生在同一年的一头一尾。因此，当《中国社会科学》纪念创刊30周年时，中国政治学界也举办了一些活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30周年。

政治学的恢复是从译介资料、培养学生、编写教材、组建机构、出版期刊起步的。1981年，复旦大学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次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此同时，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国（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系。我本人1982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学生涯。

招了学生，就得有教员与教学材料。在80年代初，即使是以以前学过政治学的教员，也“摆荒”了30多年，必须重新补课，何况这类教员数量本来就如凤毛麟角；而那些只教过国际共运

①②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5—81、291页。

③④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90、141—148、377页。

⑤ 见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第4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教员则必须从头学起、边学边教。为此,1980年初,当中国政治学会还在筹备之中时,其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1984年以后更名为《国外政治学》),主要是译介西方政治学战后的发展,一时间它几乎变成了当时政治学人的“葵花宝典”。1982年,曾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主修过政治学的赵宝煦教授主编了一本《政治学概论》,成为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教材。经过数年的筹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终于在1985年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开始出版《政治学研究》,这标志着起步阶段的结束。

在起步之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于1980年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①这个计划包含的四类研究课题已经预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未来30年的发展路径。列在首位的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马、恩、列、斯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实际上主要是欧美国家)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英、美、法、德、日)”,“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评述福利国家”,“外国政治学现状”。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如“基层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国家干部制度”,“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设置、变化情况”,“市、区、县与省、市、自治区的关系”。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各国政党史”,“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中国政治学说史”和“西方政治学说史”。

过去30年,虽然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但大致还是不出这么几个路向。不过,研究的参照系与重点却在有意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5年,《政治学研究》创刊时,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毫无疑问,那时政治学研究的参照系就是国家意识形态。而到了新世纪,谈到意识形态时,一些政治学者已开始使用过去时。在新一代学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真正需要的是,参照西方政治学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politics)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s)。^③

至于研究重点的变化,中国政治学在过去30年似乎经历了“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先是从编译起步,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源流。继而试图将从西方学来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大而化之地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的分析。其后思考逐步深入,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从“古今”与“中外”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

新一代政治学人的佼佼者——王沪宁——的学术生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④从1981年在

① 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③ 张国清:《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28页。

④ 王沪宁本科在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科的研究生。毕业后,王沪宁留校任教,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曾名噪一时;33岁时晋升至正教授,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后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读书》上发表《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开始，^①到1986年中，他在期刊上发表了23篇文章，^②其中21篇是译介西方政治学，如《拉斯韦尔及其政治学理论》（1983）、《生物政治学简介》（1983）、《美国政治学的系统分析学派》（1985）、《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述评》（1985）、《当代西方政治多元主义思潮评析》（1986）。^③这时的中国政治学者大概都像王沪宁一样，带着无限的求知渴望，试图了解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新趋势、新学派、新思潮，学习、借鉴新方法。他们大量阅读，苦苦思考，每有心得，便急不可耐地希望向同行推介，尤其是像王沪宁这样精通英法两国文字的学者。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王沪宁的研究重点移至本国。到1992年上半年，他在6年时间里发表了32篇文章，其中属于译介性质的只有一篇，与前一个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看得出，前一时期的学术积淀对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政治现象，但他借助的关键概念和分析工具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划定的范围，而是更多地源自当代西方政治学，论文列出的参考文献往往多半是欧美学者的著作。这期间，王沪宁的研究主题相当宽泛，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秩序、政治腐败、中央地方关系、行政体制改革，以至于政治审美、住房改革、村落家族文化、日美关系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确，对西方政治学有所了解后，那时不少中国政治学者都跃跃欲试，希望展示新的分析工具如何有助于剖析中国的种种政治现象。

在本不肥沃的政治学园地荒芜过几十年后，“取经”是非常必要的，“效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停留在“取经”与“效仿”阶段，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就谈不上完成。在“取经”与“效仿”的过程中，那些勤于思考的中国政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关键问题，西方取来的“经”未必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政治。这就为下一个飞跃——本土自觉——打下了认识论的基础。早在1989年，通过独立思考，王沪宁已尝试梳理出可能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六对关系：价值与操作，文化与体制，民主与权威，分化与整合，稳定与发展，情感与理性。^④20多年后回头看，这种概括显得有点过于思辨、宽泛，但本土自觉的冲动已跃然纸上了。

1992年以后，王沪宁的本土自觉逐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他发表了21篇文章，焦点集中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上。1994年，在梳理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时，王沪宁总结道：“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这个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难以形成。”^⑤这短短几句平实的话，想必是多年反思的结晶，即使今天看，也还是极具启发性。更重要的是，王沪宁指出，要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课题，必须关注四大关系，即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一党领导和民主政

在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他是中国最多产的政治学者。从“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王沪宁”名下可以查到73篇论文。

① 见《读书》1981年第12期。

② 包括这期间在国内权威刊物《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4篇文章。

③ 在这一时期，王沪宁还出版了《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 王沪宁：《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几对关系》，《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第14—19页。

⑤ 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第31页。

治之间的关系,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这四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对这些问题,王沪宁认为,西方政治学没有给出现成答案,恐怕也难以给出现成的答案。不过,恰恰因为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王沪宁自信地预言,“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①

不仅王沪宁一个人在其学术实践中走过了从“取经”到“自觉”的历程,恐怕大多数中国政治学者都有相似的轨迹,包括像我这种曾留学国外的学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步迈过了前行道路上的一个个坎。90年代中期已进入“本土自觉”境界的王沪宁大概属于先知先觉者;时至今日,相当多的学者也许仍处于“取经”与“效仿”阶段。不过,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过去30年发展迅速,让过来人回顾起来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②

首先,政治学教育蓬蓬勃勃。现在已有百余所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专业,培养层次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30年前,中国可以称得上专业政治学者的人寥若晨星;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会目前已拥有团体会员近百个,个人会员千余人,浩浩荡荡、蔚然成军。^③

其次,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仅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行政管理等主干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策科学等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出版了不少介绍性学术译著和论文。

第三,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前的关键词是“解放”、“革命”、“专政”、“阶级分析”、“路线斗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帝国主义”、“三个世界”、“反修防修”;而现在的关键词变为“政治发展”、“合法性”、“权威主义”、“权利”、“正义”、“选举”、“市民社会”、“公民文化”、“政治参与”、“稳定”、“自治”、“治理”、“宪政”、“利益集团”、“协商民主”、“全球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政治学研究十分活跃。在1993—2008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了政治学类项目658项,立项数从1993年的17项增加到2008年的82项。^④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政治学类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其他各部门、各地、各校大大小小的科研基金不计其数。投入增加必然带来产出的增加。根据公开发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篇左右,^⑤其中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期刊已由2000年的32种增至2010年的39种;^⑥其他类别的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以及各大学学

① 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第31页。

② 已有一些文章试图归纳中国政治学30年来的成就,如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2期,第48—65页;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7—72页;王邦佐、邵春霞:《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30年》,《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第11—12页。

③ 曹伟峰:《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30年会长会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9日第15版, <http://www.cass.net.cn/file/20100309260336.html>。

④ 李振:《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看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状况:基于1993—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类立项项目的分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0年第1期,第60页。

⑤ 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第88页。

⑥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2010—2011年)目录》,2009年11月25日, <http://lib.nwnu.edu.cn/refer/CSSCI2010-2011.pdf>。

报) 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① 从 CSSCI 的记录看, 近年来, 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 5000 名左右,^② 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 5000 多篇, 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③ 想必未被 CSSCI 收录的作者与论文应数倍于这些数目。除了论文以外, 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这是 30 年前难以想象的。从图 1 可以看出, 对政治学的学术关注度在过去十几年里呈现上升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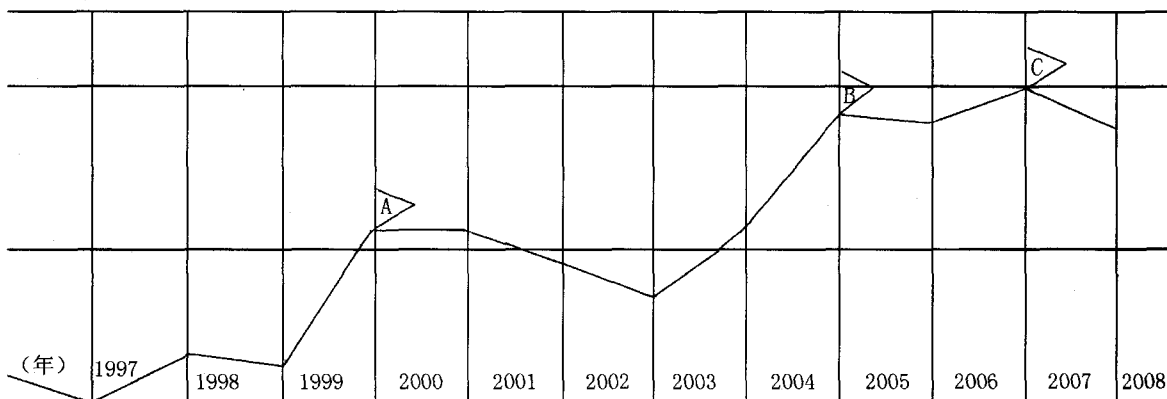


图 1 对“政治学”的学术关注度④

第五, 政治学引入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30 年前, 政治学刚刚重建时, 人们熟悉的方法是所谓旧制度主义, 也可称之为法条主义。那时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 仿佛实际政治就是如此运作的。实际政治当然并不完全按正式制度规定的方式运作, 因此西方政治学中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中国政治学重建初期最早引入的便是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30 年后, 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都有中国政治学者使用, 如个案研究、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比较研究、参与式实地考察、田野访谈、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抽象模型建立、计量检验、博弈分析等等。连政治学系的本科生也满嘴“因变量”、“自变量”、“相关关系”。当然, 目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新方法的人还不是很多。^⑤

第六, 形成了一个中华政治学圈。除了在内地进行教学与研究的政治学者 (包括在大专院校、社科院系统、解放军系统、党校系统、党政机关政策研究部门学者与研究人员) 外, 还有几百名从

① 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 基于 CSSCI 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第 89 页。

② 魏姝:《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 基于 CSSCI (2005—2006 年) 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年第 2 期, 第 69—70 页。

③ 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 基于 CSSCI 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第 89 页。

④ 图 1 是根据“CNKI 学术趋势” (<http://trend.cnki.net/index.php>) 制作的。“学术关注度”是以“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基础, 统计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 形成的学术界对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

⑤ 参见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第 113—121 页; 严洁:《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江汉论坛》2006 年第 3 期, 第 16—20 页; 谢韬、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第 2—12 页; 冯志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 对九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调查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8 年第 5 期, 第 151—156 页。

内地出国留学的政治学人，其中不少人已在美国、欧洲、澳洲和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加之两岸四地政治学界日趋频繁的接触，一个学术交流热络的华人政治学圈已俨然成形。

在高度肯定中国政治学 30 年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蓬蓬勃勃的表面背后也存在着隐忧，这可以从表 1 中看出些端倪。

从 2000—2006 年的 CSSCI 数据看，7 年间政治学论文引用各类文献共计 215851 篇次，其中中文文献被引 116034 次，占全部被引文献的 54.4%。换句话说，被引外文（包括译文）文献占总数的 45.6%。这一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33%左右）。^① 从趋势上看，政治学论文引用中文文献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从 2000 年的 56.6% 降至 2006 年的 52.1%，下降了 4.5%；而被引外文文献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尤其是英文文献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9.8% 升至 2006 年的 26.8%，上升了 7%（表 1）。

表 1 2000—2006 年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单位：篇次）

年代 \ 语种	中 文	英 文	日 文	俄 文	德 文	法 文	其他语种	译 文
2000	12247	4275	424	411	72	50	200	3954
2001	11638	4485	267	282	86	55	280	3860
2002	14393	5246	321	279	87	46	133	4475
2003	16068	6194	355	327	157	75	130	5318
2004	16673	8442	487	313	183	128	273	5830
2005	19951	10471	541	320	126	100	417	7267
2006	25064	12915	503	277	243	79	298	8760
合计	116034	52028	2898	2209	954	533	1731	39464

数据来源：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 年）：以 CSSCI 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88 页；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 CSSCI 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89 页。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从正面看，它们说明，中国的政治学者接触、阅读和参考外文学术成果的能力不断增加。如果说 20 世纪 80—90 年代论文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发表于 60—70 年代以前的过时外文文献的话，现在中国学者已经经常引用最新的外文出版物，似乎与国外政治学接上了轨。但从反面看，这些数字也说明，中国政治学这个学科受外来影响较大，本土化程度较低，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② 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合法性”）；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接轨心态”呢？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轨”，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轨”？自己这条“轨”是否一无是处？

① 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 年）：以 CSSCI 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88 页。

② 此外，CSSCI 来源期刊中也包含了较多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这可能也是造成被引外文文献比重偏高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能解释变化的趋势。

对方的“轨”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两条“轨”接不接得上?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假定西方主流政治学是先进的、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借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某些西方主流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看世界,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如果我们对它们不了解,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奉为神明。但基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精致的思想牢笼。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因而适用于西方。但这些预设未必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那些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无论如何,搞清各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预设是十分重要的。

不错,许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的确对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具有启发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模型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盲点。由于这些偏见和盲点的存在,这些理论模型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虽然我们中国政治学者生于本土,对本土有深情的关怀和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以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

由此看来,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大胆向前再跨一大步:本土化。^①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政治学,放弃对外交流。恰恰相反,本土化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拓宽交流的渠道,不仅与欧美的政治学界交流,也与亚非拉国家的学界交流,并把单向交流变为双向交流。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反对来者不拒,反对盲目接纳。用鲁迅先生的说法,这叫“拿来主义”。本土化也不是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简而言之,本土化的要求无非是三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

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角色。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②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

①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7页。这句话被译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我，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再过30年，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60年时，中国政治学界不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还能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责任编辑：范勇鹏 李彩艳〕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和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

于 沛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在其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翻译、编译，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以及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问世，其地位和影响日渐扩大，当然，这是就世界历史整个学科的状况而言。今天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究上，都可谓硕果累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① 这使广大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深受鼓舞，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中国及周边区域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分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周边区域和国家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如《大宛传》、《匈奴传》等，包括有朝鲜、越南、印度，以及大宛、乌孙、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 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而要达此目的，需要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23种史书中，都涉及了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和研究，各代官修纪传体史书都记载了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在内的概况和历史。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纪中叶，这和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先进分子为拯救民族危机“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而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② 《前汉书·司马迁传》，《二十五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8页。